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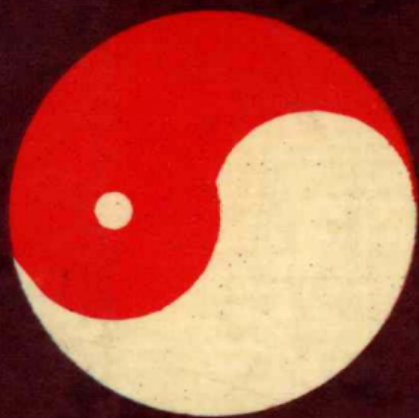
四库术数类大全

刘 波 张 文 主 编

李生龙编撰

占星术





四库：皇帝亲定之书
术数：最古老的东方文化
对不可思议的思议

ISBN7-80590-648-3 K·31

全套十册 定价：89.80元

四库术数类大全

占星术

李生龙编撰

琼新登字 03 号

责任编辑：张新奇

装帧设计：彭 子

四库术数类大全

占星术

李生龙 编撰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封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375

字数：300,000

199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7-80590-648-3/K·31

全套十册 定价：89.80元

总 序

术数，一称数术。三国韦昭称术即占术，数即历数，术数即阴阳占筮家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来推断人事吉凶，观察自然现象的种种方术。八卦、占卜、风水、奇门遁甲、占星、星命术、房中术、相术等，贯彻了术数文化系统。黄帝、伏羲、老聃、庄周、孔子、姑布子卿、张道陵、丘处机、王重阳等一大批华夏文化英雄，都是这种文化的代表人物。

《四库全书》专列术数类，汇编术数著作50种，我们所编撰的四库术数类大全，主要以这部分著作为蓝本，进行点校整理和阐释。另选集了大量散见于《四库全书》其他部类有关术数的著作以及未收入《四库全书》的术数著作。就术数这一类文化而言，真可谓洋洋大观。所以丛书名之为“四库术数类大全”。

术数文化渊源流长，传播极为广泛，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普遍地接受过术数文化的传播。它的确在相当深刻的程度里曾经作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和心理依赖，作为原始精神失落的补偿。

为什么在科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人们仍然乐道于此？

我们似乎可以这么理解：术数作为中国古文化的一个重要部类，我们无论从历史的角度、民俗学角度、古文化学角度，都有必要了解它，它的确蕴藏了中国古代哲学、宗教，乃至医学、建筑学、天文学等大量可供研究的资料，我们不该轻易毁弃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术数中包括了大量充满神秘和迷信、违反科学的东西，这是不容论辩的事实。那么，我们从破除迷信，倡导科学的角度言，也有必要了解它。不了解便无从谈起破除。

诚然，补偿过过去的东西也许仍有效于今天。但是，术数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补偿现代精神的失落，我们一方面对此划下一个深深的问号，一方面我们也正视一个现实：在今天工业文明较为发达的日本、新加坡、韩国和香港、台湾等处，许多人对术数这个古老的东方文化深信不移，津津乐道。

不论事实将向怎样的方向发展，我们都坚信一条：既然古老的不列颠文化、日耳曼文化、法兰西文化、大和文化 and 年轻的美利坚文化都对世界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悠久的华夏文化也必将以其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和包罗万象的博大气派，辐射到世界各地。

刘波 张文
于癸酉仲夏

目 录

- 一 从与天文学同胞共体到分道扬镳
 - 占星术发展简史 (1)
 - (一)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占星术也
 随之滥觞 (2)
 - (二) 占星之术，详于秦汉以下，而大备于唐
 (7)
 - (三) 宋元以下，占星术逐渐与天文学分道而行，
 至明末以后遂趋于衰微 (15)
 - (四) 占星术已成历史遗迹，何以还要研究它
 (18)

- 二 在庞大的星象体系背后和频繁的占验活动中，占星术告诉了我们什么
 - 占星术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心理 (21)
 - (一) 星区划分和星象命名，折射着历史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22)
 - (二) 动辄凶多吉少，潜藏着人们对自然变异的

恐惧感和对人事变故的忧患意识…………… (27)

三 天人之际，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古老命题

——占星术同古代哲学的关系…………… (38)

(一) 天命论：粗糙的天人感应观…………… (39)

(二)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人感应观对人
本思想的吸收…………… (40)

(三) 五行、阴阳、气：构成精致天人感应观的
三要素…………… (42)

1 五行观念：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
…………… (42)

2 阴阳观念：天地之常，一阴一阳 …… (45)

3 气的观念：轻阳者上扬而为天，重浊凝
滞而为地，精钟为星，同气相应…………… (46)

四 想象、神话、题材、典故：占星术的魅力之所在

——占星术与文学艺术的关系…………… (53)

(一) 满天星斗，足可以驰骋神思…………… (53)

(二) 占星术与神话结缘，更增神奇…………… (59)

(三) 文学之题材典故，也时常出入于占星术中
…………… (64)

五 占星术语诠释…………… (70)

(一) 星色和亮度…………… (70)

(二) 大小和形状…………… (72)

(三) 入宿度和去极度…………… (73)

(四) 《灵台秘苑》所载“占例” …… (77)

(五) 分野.....	(87)
六 常见天象图解.....	(95)
(一) 紫微垣.....	(95)
太微垣.....	(99)
(三) 天市垣.....	(102)
(四) 二十八宿.....	(104)
(五) 七曜.....	(155)
(六) 客星.....	(170)
(七) 彗星.....	(173)
(八) 流星.....	(178)
(九) 风雨云气.....	(182)
七 占星原著精选.....	(190)
(一) 《灵台秘苑》.....	(190)
(二) 《开元占经》.....	(258)

一 从与天文学同胞共体到分道扬镳

——占星术发展简史

占星术是我国古老文化中遗留下来的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遗物，一个尚多少有点开发价值的遗址。随着科学的发展，一般人早已抛弃了它，遗忘了它。但对从事科学史（特别是天文学史）、文化史研究的人来说，它却是一份值得重视的遗产。

占星术的起源、发展与天文学可以说是同步的。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中，占星术与天文学共同携手走过很长的路，是血肉相连的同胞兄弟。后来他的同胞兄弟越来越成熟了，能独立走自己的路了，回过头来发现他太愚昧，就渐渐地疏远了他，直至最后抛弃了他。

因为与天文学是兄弟，所以天文学所观察的，他也观察。天文学看太阳、月亮、恒星、行星，还有数不清的彗星、客星（新星）和流星，他也看；天文学测量周天的度数，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四季的变化，他也参加；天文学重观察和测量纪录，他也手不停笔，史不绝书。他们不同的地方，是

天文学总喜欢作理性的思考，注意对自然本身的观察、测算，求真求实，他却总喜欢把天象同人间社会联系起来，相信冥冥之中有个什么神灵，通过天象的变异向人间预示吉凶祸福。他总是把国家的兴亡，王朝的盛衰，政治的良窳，民生的苦乐，事业的成败，战争的胜负，人命的寿夭同日月星辰的色彩、形状、位置、运行的方位等所呈现的变化串通起来加以解释，说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并总是依据后者论断前者。由于兄弟之间有这种分歧，天文学就当了科学家，而他却当了神学家。

（一）“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占星术也随之滥觞

无论天文学还是占星学的产生，都是同人们的需要有关。在中国，农业的需要产生了天文学，在古巴比伦、埃及、印度等国家也是如此。占星术的产生最早可能与原始宗教信仰的需要有关，后来它则附属于政治，与政治的需要相适应。

随着地下文物的发掘，人们对史前时期的情况了解得多一点了。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过一个彩陶，可能是一件礼器，上面有太阳的图象。它距今约4500年，可视为天文学、占星术的萌芽。（可参考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1978年第9期）

古籍中有很多关于上古天文学、占星学方面的记载。例如《周语·楚语下》中谈到黄帝之子少皞的时代，“民神杂糅”的情景，那时人人可享有祭祀权，个个都可做巫史。到了颛顼时代，这种情况就有了变化，他命令南正重司天，以

分出神的职位次序，又命火正黎司地，掌管人民。《尚书·尧典》记载尧委任羲氏父子掌管天文，司察日月星辰。那时他们已能掌握四星中天（指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确立四季（有些人认为是确立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说明他们对星宿、心宿、虚宿、昴宿等恒星的出现与季节的关系已有相当长时间的观测。他们还把一年分为三百六十六天，并以闰月定四时。《尚书·胤征篇》记载夏代仲康时代主管天文的羲氏与和氏沉湎于纵酒享乐，以至于“昏迷于天象”，后来季秋月朔那天（唐代一行推算为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即公元前2155年）发生了“辰弗集于房”（一般认为指发生了日食）的情况，他们都未能预报，结果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乐师们敲着鼓，嗇夫骑着马奔跑，老百姓竞相奔走，赶紧来营救太阳。为了这么一件事，仲康命令胤侯率军去征讨羲和。这些记载虽带有很大的传说性质，但它们对我们了解上古的天文、占星术的大致情况是有参考价值的。

商代的情况比较清楚一点，在发掘出来的甲骨卜辞中，其中与天象有关的为数不少，其中有涉及日月食的，有涉及恒星的，（如鸟星、侑火、鹳星等），有涉及行星的（如岁星），有涉及新星的，还有些尚待进一步研究。可见商人非常重视对天象的观察和记录。商代的神学也是很有势力的，这些天象都以占卜的形式出现在卜辞中，就是明证。商代有一位著名的占星家叫巫咸，在《开元占经》中，保存了一部分巫咸的遗说。这些遗说大都把天象与大事的吉凶祸福联系起来。但这些遗说涉及的天象比卜辞远远为多，并涉及到行星运行的一系列问题，理论上也比较成系统，可能不是巫咸旧说的原貌，或系后人的假托之作。商代的巫者兼掌天文历法，说明

天文学和卜祝之学是混合在一起的，这时所谓的天文学，实则就是占星术。商代在天象观测和记录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与占星学是密不可分的。

周代对天文学、占星术也是很重视的。《诗经》中春秋以前的作品（如《豳风·七月》）已涉及到很多天象。顾炎武《日知录》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但他所举的例子，如“七月流火”（《七月》）“三星在天”（《诗经·唐风·绸缪》），“月离于毕”（《诗经·小雅·渐渐之石》）等，大多是周代材料，这些话出于农夫、妇女、戍卒之口，可见周代天文知识的普及。周代著名的天文家兼占星家有周武王时的太史尹佚和周灵王时的大夫苋弘。周代同商代不一样的地方，是周人虽然也相信天象能降灾降祸，却很重视人事本身。名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等就出于《周书》。周人的这种理性精神，有助于天文学的发展。但周人对星占也是极重视的。《周礼》卷二十五有“眡祲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的记载。所谓十辉，指祲、象、孛（《晋书·天文志中》作“觜”）、监、暗、菅、弥、叙、隋、想。对这十辉，后人解释不同，以《晋书·天文志》最为明了，可以参看。十辉主要指太阳所出现的云气、珥、光晕之类，但分类如此地细致，可见当时占星术研究的深入。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和占星术都有长足的发展。人们对天文某些规律的掌握从孟子所说的“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孟子·离娄下》）一语可见一斑。荀子也说过“天行有常”（《荀子·天论》）。这时对日月五星及二十八宿的观测都已比较系统，并建立起了用以测量星宿位置的赤道坐标系。这一时期著名的天文家兼占星家宋有子韦，郑有裨灶，齐有甘

德（一说为楚人），楚有唐 ，赵有尹皋，魏有石申。这些人当中，以甘德和石申的成就为最大。石申著有《天文星占》八卷。原书已佚，部分存于《开元占经》之中，后人从此书和其他书中辑出，可窥见其大概。石氏对二十八宿距星的距度、去极度以及一百一十五颗恒星的入宿度和去极度都有观测纪录；为后世的天体测量学打下了基础。在这一时期的一些著作如《春秋》、《左传》中，关于日食、月食、彗星、流星、流星雨、陨石等都有大量记载，其中包括全世界最早记录的哈雷彗星记事。《史记·天官书》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蚀三十六次，彗星三次出现，宋襄公时星陨如雨，都是根据这些著作所作的统计。

由于天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人们对天象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对天文方面提出过不少疑问。如《庄子·天运篇》就曾问：“天是怎样运行的呢？地是怎样安放的呢？日月是各自在自己的处所争相运动吗？是谁在主使它们？是谁在安排它们的秩序？是谁坐着无事可干去推动它们运行，莫非是它们都有机关才运转不停吗？……”《楚辞·天问》也提出过类似问题。对天文方面的问题，有些人也试图作出自己的回答。例如魏国的惠施就曾回答楚人黄缭提出的天地何以不坠不陷的问题。他甚至可以“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庄子·天下篇》），这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谈说，是需要广博的知识的。而天文学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正是这些知识的来源。

天文知识的丰富对人们思想的解放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很多哲学家、思想家都在试图建立起自己富于理性、思辩特色的思想体系。神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批判；与此相联系的是政治思想方面的解放，人们相信人间社会的治乱

完全可以通过人类自身的调节、改良来把握，不一定要受天意来控制。一些人甚至提出了人定胜天的观点。

但是天文学和占星术相伴而生的格局并没有打破。天道赏善罚恶的观念在当时仍有极深的影响。在石申的富有天文研究成就的《天文星占》中，大量的内容是讲天象变异同人间社会吉凶祸福的关系：大约在战国时代，分野的理论随着二十八宿体系的确立也确立了起来。它把天上的星宿划分成若干区域以与地上的诸侯国对应起来，一方面是为了观测的便利，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为了占测吉凶的需要。有了分野，天上某一星宿的变异就与地上某一地区的祸福直接联系了起来，可以使占星预测更趋向具体和细密。这时占星家也企图把人间大大小小的变故都与天象变异联系起来，把什么都说成是天意使然。司马迁说战国时“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机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即纵横）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史记·天官书》）这是说，由于当时战争不断，城邑人民屡遭屠杀，加上饥饿疾病等痛苦，诸侯君臣都处于忧患之中，所以特别急需占星术来预测吉凶祸福。而尹皋、唐昧、甘德、石申等人根据当时的需要，所论的灾异也就大小毕陈，甚至细碎到米盐般的小事。这种相信星占术的风气不仅在官方是如此，在民间也是如此。《左传》僖公五年所载卜偃用以预测虢公出奔的就是一首童谣。

(二) 占星之术，详于秦汉 以下，而大备于唐

秦汉时期主要是汉代，是天文学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在汉初初，标志这种重大成就的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云气星象杂占》和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五星占》对行星的顺行（由西往东运行）、逆行（由东向西运行）、留（顺行由快而慢，从地上观察，似乎未动）等都有记载。《隋书·天文志》说：“古历五星并顺行，秦历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并时，自有差异。汉初测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这是说，秦以前天文家认为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都只是由西向东运行，秦代才发现金星、火星有逆行现象，到汉初经过进一步观测，才发现五大行星都有逆行的现象。《五星占》还详细地记载了自秦始皇元年（公元前 246 年）至汉文帝三年（公元前 177 年）七十年间的木星、土星和金星的位置，并对它们的会合周期有相当精确的数据记录。《云气星象杂占》对彗星的观测已相当细致，并有二十九幅彗星图。《史记·天官书》则对二十八宿、五星等有全面的记录，它共记载了九十一个星官，五百余颗恒星。它既是对前代星象观测成果的一个总结，又是自成体系的独立的星象著作。它所用的星官名称绝大部分为后世天文学家所继承。汉代对星数的发现可以说是一个全盛时期。至马续写《汉书·天文志》时，已称：“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考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张衡《灵宪》则说：“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

五百，而海人之占，盖未存焉。微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这个数量，较之《史记》所载，是十分惊人的。彗星的数量到京房时已达到三十五种，比《五星占》多十余种（《五星占》虽有二十九种，但有些彗星同名，实只有十九种）。《汉书·天文志》记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六月“客星见于房”，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第一颗客星。汉代在历法的编制和天文测量仪器的创制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因与占星术这一话题关系不甚密切，这里就不一一缕述了。

汉代天文学的发展对汉代的哲学影响特别深刻。汉人关于宇宙的起源、天体的形状、构成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淮南子·天文训》在总结前人关于“气”的学说的基础上，把天地、日月星辰都解释为气的分化的产物。关于天体的形状则有盖天说与浑天说等猜测。盖天说最早见于《周髀算经》，它认为天像个圆盖，地像个倒扣着的盘子，日月星辰都嵌在天盖上旋转。扬雄曾对此说提出质疑。浑天说起于战国，有人认为惠施最早提出这种构想，汉人落下闳、扬雄、张衡等都主此说。浑天说认为天体像个弹丸，是圆的；地像蛋黄独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如蛋壳包裹蛋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天转如同车毂，周旋无端，形状浑浑沌沌，所以叫浑天。浑天说实际上是主张地球中心说，但张衡又说，在浑天之外，还有所谓宇宙，“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灵宪》）这就把浑天看作是无限宇宙中的一个部分了。这种猜测，很富于辩证法的特色。汉人对宇宙的看法是天文学发展的产物，但它反过来又对天文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关于天体的构成也有很多说法，如认为太阳是火构成的，月亮是水构成的等，它与阴阳五行学说有